

“文化大革命”史 专题

徐文生 编写

西南交通大学

西北大學書畫 卷一

許文生 編寫

西南交通大學

“文化大革命”史

专题

徐文生 编写

西南交通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
一、1966年前后的形势·····	(1)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2)
三、打倒彭、罗、陆、杨·····	(7)
四、“文化大革命”纲领《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林彪的 “五·一八”讲话·····	(19)
五、混乱局面的出现·····	(24)
六、“造反有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声·····	(28)
七、“炮打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骤然升温 ·····	(32)
八、林彪跃居党内“2号位置”·····	(39)
第二章 红卫兵运动·····	(45)
一、红卫兵的起源·····	(45)
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48)
三、全国大串联·····	(51)
四、破四旧·····	(54)
五、红卫兵失宠·····	(68)
六、上山下乡运动·····	(75)
七、对红卫兵运动的怀疑与反思·····	(81)
第三章 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	(85)
一、安亭事件：上海大动乱的开始·····	(85)
二、康平路事件：全国武斗的发端·····	(87)
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的幕后·····	(90)
四、“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开始全面夺权·····	(94)

五、“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被镇压	(96)
六、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98)
七、上海“一月革命”对全国的影响	(101)
八、“一月革命”性质的分析	(104)
第四章 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106)
一、二月抗争的起因	(106)
二、多次激烈的抗争	(118)
三、被打成“逆流”，遭到错误批判	(123)
四、“二月逆流”的平反	(139)
五、二月抗争的意义	(142)
第五章 刘少奇大冤案的铸成	(146)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146)
二、对刘少奇的荒谬批判	(154)
三、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166)
四、历史公正，冤案彻底昭雪	(173)
第六章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及其破产	(176)
一、林彪为什么会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176)
二、林彪为什么急于抢班夺权	(183)
三、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厮杀	(186)
四、狗急跳墙，策划武装政变	(190)
五、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自取灭亡	(192)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邓小平	(200)
一、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下放江西	(200)
二、“九·一三”事件后的复出	(203)
三、在四届人大组阁前夕与“四人帮”的斗争	(206)
四、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工作	(210)
五、在全面整顿之后再次被打倒	(214)
六、冲破“两个凡是”后第三次复出	(218)
第八章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及其破产	(223)

一、“四人帮”的形成	(223)
二、毛泽东批判“四人帮”	(228)
三、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大失人心	(235)
四、以快打慢——叶剑英的谋划	(243)
五、华国锋下达执行令	(249)
六、铁腕汪东兴	(254)
第九章 “文革红人”的沉浮	(260)
一、王洪文的发迹	(260)
二、乱世魔女——聂元梓	(268)
三、“白卷英雄”张铁生	(277)
四、李庆霖状告“上山下乡”	(284)
五、不可一世的“蒯司令”	(290)
六、特殊人物毛远新	(297)
七、郭风莲东山再起	(306)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一、1966年前后的形势

进入60年代后，国际形势呈现出大分化、大动荡的局面。中苏关系异常紧张，苏联领导人不仅撕毁了中苏之间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全部撤走了苏联在华的专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发展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并制造了伊犁事件，引诱和胁迫数万中国公民进入苏联国境，而且还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侵犯中国的边境。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的巨大压力，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期间，中美关系亦更加恶化。美国在1964年秋制造所谓“北部湾事件”，出动大批军舰侵入北部湾，向越南人民寻衅。到1965年春，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又派遣大批海陆空军进入越南，并把战火由越南南方引向北方和整个印度支那，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在国内，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就在人民战胜因“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灾难，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却变得似乎越来越严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步升级，党内高级领导层内出现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不断发展。在我们党过去长期的战斗岁月中，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一篇报告，一项决策就可以使全党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夺取胜利。毛泽东是那样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信赖，以至后来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曾形象地写道，生活在那些非凡的年代里对领袖的无限忠诚，而从不对他的任何指示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因为毛泽东在思考，而他个人的思考往

往高于全党的其它同志。所以，当毛泽东后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时，党内并没有过多的异议。在过去几年里，毛泽东据此发动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全党同志也是认认真真地去执行。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些举措都是小打小闹，不足以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社会改革理想。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决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的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进步只能靠“波浪式”推进逐步实现。为掀起这场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毛泽东的这些举措，为林彪、江青、康生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在前面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50年代末期，毛泽东曾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正是这种“不放心”的心态，加上他本人一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敏感，以及1962年以后对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的估计，终于使林彪、江青这些窥伺时机的野心家得以利用，借《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推波助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内乱的导火索。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年11月19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

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不是一般的文艺评论，而是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它实际上把矛头对着中央部分领导人。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运动，在文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里进行了全面的“揭盖子”斗争。

《海瑞罢官》一戏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历文学家吴晗写的。吴晗(1909—1969)，192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抗日战争时期任教于西南联大。以研究明史著称。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吴晗为什么要写这个戏呢？可以说是由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但其主要目的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最早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是毛泽东。他在1959年上海会议上，批评了党内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讲了明朝海瑞的故事，说应当提倡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又说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敢讲真话、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参加会议的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向文艺界一些同志谈了此事。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找吴晗谈了，约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先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又写了《论海瑞》。由于此时正值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问题，所以，吴晗在此文的结尾特别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以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后来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等人要求吴晗为他们写部海瑞戏。吴晗本不懂京戏、盛情难却，勉强答应。从写提纲开始，经过七次大的修改。1960年底，剧本写出来了，原名《海瑞》。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植物学家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看望吴晗时读了剧本，他认为，剧本并非写海瑞一生，为区别于其他海瑞戏，提议改为《海瑞罢官》。从上述过程中，可见此戏与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斗争并无联系。

可是，江青、康生等人却处心积虑地要抓住这个剧本大做文章。1962年，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被拒绝。以后，江青又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但找的几个人都不愿意承担。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跟彭德怀有关。毛泽东开始虽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未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得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便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出了这篇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别人都不知道。文章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后，送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1962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表现，是“一株毒草”。因此，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应，出现了大量的不同意见。仅上海《文汇报》编辑部就收到3000多件来信来稿，大多是对姚文元的批驳。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份内部刊物反映了上海知识界人士的观点，他们认为，姚文元的文章“火气太大”，“批判搞得太高”，是“政治罗网，陷人于罪”，是“大棒子”，搞“文字狱”。当时，中央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不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都不同意这种不讲道理，纯学阀腔调的文章。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发姚文元的文章。凡是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北京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点党性来。非但如此，彭真还以书记处副总书记的名义向上海市委打电话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怎么不向书记处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采取慎重态度，北京各报刊在十多天内未予转载。

当时作为中央书记处负责常务工作的书记、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人的彭真，曾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认为应允许赞成吴晗和赞成姚文元双方的各种意见都讲，要真正地当一个学术问题

展开讨论。同时在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作了努力。安排吴晗暂时化名去北京附近的一个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吴晗曾对别人说：“彭德怀是打仗有功将领，我很钦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有关系。”“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但他还是勉强地写一份《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于1965年1227日的《北京日报》。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讲：“据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但是，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吴晗的目的，反而更引起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信任，并成为彭真的“反党罪行”之一。

江青眼看全国报纸都按兵不动，北京还准备追查，不禁大怒，马上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主席，他们都是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头的，按说应该闻风而动，可是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按兵不动，还打电话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你看看，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应该想办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毛泽东想想，果断地说：让上海印小册子，全国发行。给我要北京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对全国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作出安排。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请书记处副秘书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转载姚文元文章问题。大家按照开会的时间，一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等着。过了一会儿，彭真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坐下来，问邓拓：“老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大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时的处境很为难。明摆着，批判吴晗是不对的。吴晗写海瑞戏是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经过胡乔木再三动员才写的。他写海瑞戏是开始于上海会议，几个月后才出现了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两者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况且，今日批了海瑞罢官，明日又会怎么样？彭真不由得看了邓拓几眼，为他担起心来。这

位邓拓在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引蛇”不力，被调离《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当了一名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前几年他为《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在上面发表了一百多篇杂文，后来还结集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与吴晗、廖沫沙等市领导合作为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了一个专栏，名字叫《三家村札记》。彭真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很欣赏他的文章，但也对其中的《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感到吃惊，他知道这两篇文章是针对“左”倾和空想等问题而写的，很替他担心。

彭真明白，他反对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可能会遇到打击，乃至不幸。但他是书记处副书记，历史已经把他推到了政治大决斗的风口浪尖上，为了保护党的干部，为了中华民族不致沦入一场大灾难，他决计牺牲自己，尽力遏制这个来势凶险的“左”祸。

经过讨论，大家感到周恩来过问此事，不转载是不行了。彭真说：“转载可以；但一定要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以内，不要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后决定先由《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其他报纸依次转载。彭真作了这些部署后，怕吴晗精神上受不了这种打击，便把他找到国际饭店，对他交了底，鼓励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感激地点点头。这几天，吴晗坐卧不安，茶饭不思，他本来就瘦，这一来就更瘦了。

国际饭店正在开市委工作会议，吴晗走后，彭真找邓拓商量说：“老邓，你来写一篇文章，从学术的角度上批批吴晗，也可以为学术讨论引路嘛！”邓拓想了想说：“那就写一篇从海瑞罢官谈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吧。”彭真赞许地点点头：“我看这个题目就好，你先写，写出后我再看看，由我修改定稿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在作了这些部署后，为了正确引导学术争鸣，彭真又准备起草汇报提纲。原来为了领导文化批判运动，中央已于7月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彭真任组长，康生任副组长，陆定一、许立群、姚溱是组员。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学术界争论较多，也有人想把《海瑞罢

官)往政治上扯。彭真感到自己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有责任制定一个向中央提交的文化批判汇报提纲,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国,正确地引导运动。彭真把自己的想法向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汇报了,他们也觉得很有必要,让他快点写出来,送毛泽东审阅,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在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于是,彭真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经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准备报经毛泽东同意发向全国,试图限制当时过火的倾向。

三、打倒彭、罗、陆、杨

《二月提纲》拟好后,彭真、康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彭真的汇报,一直不置可否。彭真汇报完了,毛泽东神色冷峻地问道:“吴晗写《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关系没有?”彭真坦然地说:“根据调查,《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没有联系。”毛泽东拉长声音反问道:“是吗?我听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老,你说是吗?”康生吱吱唔唔了几句,别人也没听清他说的什么。毛泽东也没有再说什么,把茶碗的盖子扣在茶碗上表示送客。

彭真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常委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中央常委见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汇报提纲,以为毛泽东基本同意了,便让彭真代中央写了批语,把“二月汇报提纲”发了下去。

彭真以为“二月汇报提纲”经毛泽东审阅,从此可以把调动着的那股给全国人民可能带来巨大灾害的祸水的澜头按下去,但是他想错了。就在提纲发下去不久,江青就和康生跑到武汉向毛泽东告了状。江青这时刚在上海受林彪委托,搞了一个全军文艺座谈会纪要,把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打成是黑线专政。过去由于罗瑞卿的反对,她一直不能穿军装,现在堂而皇之地穿起了新式军装。其实,江青在过去不能穿军装怪不上罗瑞卿,因为穿军装就得佩戴军衔,江青没有军衔,自然不能穿军装。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军衔制度

已于去年5月取消，新式军装没有任何标志，只在领口两侧缀有两块红领巾章，表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软檐战斗帽上缀有红五角星帽徽，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江青现在可以很方便地穿起了军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江青自延安和毛泽东结婚后，忍耐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可以大露峥嵘了。3月28日，江青约上康生、张春桥去武汉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勾结在一起，要在二月发动兵变，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他和常委的讲话；陆定一指使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攻击林彪；彭真又拒绝转载姚文元文章；罗瑞卿大抓军队抢夺军权。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从哪里着手呢？就在这时，江青、康生又上门告状来了。

江青、康生事先已研究了汇报策略，决定挑选毛泽东最忌讳的事汇报，挑起毛泽东的怒火，尽速把彭真等人拉下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尽快爬上去。汇报一开始，康生就挑拨道：“彭真他们是反对主席的，他们包庇吴晗，公然反驳主席。他们眼里还有主席吗？”江青火上浇油，紧跟着说：“北京已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就要出大问题。”

毛泽东沉着脸，一直在静静地听，但他拿烟的手指却有些抖动。康生观颜察色，知道这些话打动了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听完汇报，一下掐灭烟头说：“我看是时候了……”

康生从武汉回来，变得不可一世，他把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找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中又添油加醋地加进去了许多自己的话。周、邓并不知道康生等人去汇报的事，现在又不好打电话去向毛泽东核对康生传达的真假。不过从康生狂骄、蛮横的态度上，他们也猜到了康生这次是奉旨回朝，地动山摇。在康生的胁迫下，中央书记处只好召开会议，解决彭真的问题。会议从4月9日开始，连开四天。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一言不发，只听康生在会上发言。这位专门靠整人过日子的斗争专家，一来是觉得已经撕破了脸皮，只有斗争到底才

有出路,二是取得了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所以放胆批去,整整讲了四天,用一句后来发出的中央文件里的话来说,就是“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康生批彭真这般卖力,陈伯达唯恐落后,论功行赏起来没有自己的份,也不时地用他的福建方言大讲一通,就是所谓的“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与其说是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参加,不如说是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周恩来、邓小平一心想保护彭真过关,康生、陈伯达则用毛泽东的指示来压他们,逼着中央书记处通过决议,撤销“二月汇报提纲”。

其实,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不过是一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刚开完,毛泽东便通知中央常委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南下,他在武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更是声嘶力竭地大骂彭真,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因带头发难有功,都进了文化革命小组。从此,江青就以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从幕后站到了台前,假毛泽东的威信而对其他上自刘少奇,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和国公民任意笑骂了。

整倒了彭真,接下来挨整的是罗瑞卿大将。罗瑞卿当时身兼甚多要职,主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主管军队的实权人物。他的主要罪状也是两条: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这实在也是两条极为荒唐的罪名。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和平时期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组织军队内部的大比武,也是促进军事训练的有益之举。可是却偏偏与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倡导的“突出政治”那

一套发生了矛盾。林彪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借口下，搞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政治学习要“雷打不动”，却不准抓紧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也不赞成搞大比武。对于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学习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提法，罗瑞卿也不赞成，并略有微词，这便成了“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的弥天大罪。

所谓罗瑞卿要“抢林彪的班，夺林彪的权”事情就更为玄妙。原来毛泽东接到吴法宪写信揭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前，罗瑞卿曾托他转告叶群，要林彪下台，不要管军队的事了，军队的事由他罗瑞卿管就可以了。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明明是夺权嘛！”刘少奇、朱德等人听了，确实大吃一惊，罗瑞卿平常工作不错嘛，怎么会夺军权。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解决总参谋长的问题，并要吴法宪到会以便调查和询问。

明天就要开会了，会议驻地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在林彪的住所里，有两个人正在紧张地进行谈话。一个是林彪的夫人叶群，一个是继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按着林彪的要求，吴法宪已经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揭发罗瑞卿通过刘亚楼传话夺军权。但他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见识过中央政治局斗争的大场面，一听说要他在明天的中央常委会上发言，不禁心惊肉跳，汗水顺着胖胖的脸流下来。叶群给他打气说：“你怕什么，罗瑞卿和刘亚楼谈话是在病房里，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现在刘亚楼已经死了，你揭发他们谈了些什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你怕什么？”吴法宪流着口水说：“不怕，不怕。”叶群鼓励道：“这就对了，另外告诉你，林总已经通知总参，把你的级别由六级升为五级。”吴法宪赶紧表示忠心：“你转告林总，我跟罗瑞卿誓不两立，林总指到那里，我就打到那里。”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一召开，吴法宪又拿出当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整彭德怀的劲头，大喊一声“我揭发”，在得到允许后，便慷慨激昂地揭发起来：“罗长子在我们空军活动得很厉害，他对刘亚楼司令员说，有四条意见请他转告叶群，1、林彪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不出也得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3、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瑞卿还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马列主义顶峰。刘亚楼司令员后来识破了罗长子的阴谋，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要我向中央揭发。”

吴法宪的话使常委们吃了一惊，刘少奇问叶群：“刘亚楼是否向你转告过罗瑞卿的那些话？”叶群镇定地说：“讲了，我来揭发。”她拿过麦克风，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对罗瑞卿大泼污水。刘少奇虽然不大相信这些话，但唯一的证人刘亚楼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啊！

为了确证吴法宪和叶群的揭发是否属实，中央常委决定调查一下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这么大的事，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死荣辱，刘亚楼不会不向自己的夫人说的。

吴法宪听说中央要调查翟云英，慌了手脚，连忙跑到叶群这里来讨教。叶群狠狠地说：“吴胖子，你已经出了头了，现在只有一条道走到底才有生路。你要是半路退出，林总不会饶你；人家也不会放过你。栽赃陷害总参谋长，最轻也要判你个死缓。”吴法宪听了汗如雨下，哀求道：“你不要吓我了，赶快教我个法吧。”叶群眼一转就有了主意：“去找翟云英，让她写个证明不就得了。”吴法宪担心地说：“她要是不写呢？”叶群突然发怒，骂道：“你怎么这么废物，你手中的权是干什么的？”

叶群的布置正赶到点子上了，以后调查人员去问翟云英时，翟云英说，她曾看到刘亚楼在临终前向她伸出四个手指头，似有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就去世了。中央常委一商量，认为罗瑞卿确实讲过四点要求，必须把他的总参谋长拿掉，让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中央决定总长易人后，派了一架飞机去接罗瑞卿。

罗瑞卿这时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大比武，他眼里看着比武场上龙腾虎跃的战士展示着高超的军事技能，心里却不时掠过一种不祥的感觉。今年2月，他去上海向林彪汇报自己的工作，林彪对他异常客气，笑眯眯地说：“十个大将，陈赓已在前几年病逝了，现在的几位，